

组织理论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第4版

〔美〕W. 理查德·斯格特 著

华夏出版社
Prentice Hall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组织理论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美〕 W. Richard Scott 著
黄洋 李霞 申薇 席侃 译
邱泽奇 译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美)斯格特著;黄洋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2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ISBN 7-5080-2614-4

I. 组… II. ①斯… ②黄… III. ①组织学 IV. 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216 号

W. Richard Scott: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Copyright © 1998 by Prentice Hall Inc.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第四版于 1998 年出版,版权为 Prentice Hall Inc. 所有。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Prentice Hall Inc.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1959 号

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

[美] W. 理查德·斯格特 著

黄 洋 李 霞 申 薇 席 侃 译

邱泽奇 译校

策 划:刘 力 陈小兰

责任编辑:杨贵凤 王 璇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先锋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988 1/16 开

印 张:26.75

字 数:450 千字

定 价:45.00 元

总 序

中国社会学自 1979 年中央决定予以恢复以来,已经 20 年过去了。当时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我想不仅仅是对于历史上“左”的东西“拨乱反正”,也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事业对于这个学科的实际需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系统和科学的认识。社会学是一门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科,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社会迅速变化发展的改革时代,社会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学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大发展。历史前进的步伐要求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在理论、方法、具体专题上的研究能够跟得上我国实际社会的发展,而且应当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研究专题上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改革开放 20 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 12 亿人参与的伟大社会变革是社会学生长、发展的最肥沃的土壤,也应当结出社会学灿烂丰硕的果实。但是,坦率地说,我们所做的距离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

我曾经多次说过,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80 年代初我说,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要教材,即需要一批对课程内容十分熟悉的教师和一批高质量的教材。但是这个学科中断了近 30 年,解放前的教材许多都不适用了,过去从事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是年纪已大,二是多年改行,等于是完全重建一个学科。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作为起步阶段,我们 1980 年在北京开办了暑期社会学讲习班,请了一些国外的学者来讲课,后来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社会学培训班。这些培训活动为后来各地建系、建研究所打了一个基础。到了 80 年代中期以后,

有一批在国外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取得学位回国,加强了国内社会学的力量,也为中国社会学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与联系拓展了渠道。今天虽然在一些大学和社会科学院成立和发展了一批社会学系和研究所,培养了不少学生,也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社会学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今天可以说仍然处在这个学科的重建过程之中,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头脑必须清醒,仍然需要坚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踏稳了前进。

在培养教师和编写教材方面,应当说这些年来大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成绩是应当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还很不充分;国外社会学界的最新动态,他们在理论思考方面的新探索,在社会调查中开拓的新课题和在研究中做出的新成果,还不能够及时地反映到我们的教材中来。我们绝大多数教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和学生,还做不到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所以精心地选择一些在国外一流大学通用的、学术水平和思想深度公认比较优秀的教材,把它们翻译过来,洋为中用,提供给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做参考,以补充国内教材的不足,是目前阶段学科建设需要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我去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提出了“补课”的问题,我自己带头重新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写了一些读书札记一类的文章,也要求研究所的年轻教员和学生更认真地读书。我感觉,有些人的学术基础原来并没有打好,毕业后忙于做课题、写文章,但是写的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功底不够。我由此想到,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帮助年轻人打好学术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和一批优秀的课程。

最近一个时期,高等学校正在积极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为了在21世纪建设成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在体制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学系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相互打通,这样可以使教学与科研结合得更好,得以把两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对于学科建设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我希望今后北京大学在社会学教材与课程建设方面能够多发挥些作用,与其他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们一起,为教学质量

的提高和学科的长远发展共同努力。

华夏出版社积极于出版社会学的翻译教材,对于高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应当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如何结合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教材和自己编著教材的现状,根据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专题领域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大家共同商议,制定出一个计划,从国外社会学公认的优秀教材中仔细选择一些书,同时认真选择译者和校者,保证翻译质量,逐步分批推出,我相信这将对于我国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和课程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也是北京大学应当积极参与并努力做好的一项服务工作。

同时,社会学恢复有 20 年了,我希望我国学者自己在积累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陆续出版一批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逐步做到以我们自己的教材为主、翻译教材为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就会真正逐步成熟起来。21 世纪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全球化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相互碰撞中也隐藏着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了解其他社会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则,也需要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精髓,逐步在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他人,真正做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我想这应当是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可妄自菲薄。翻译国外的优秀社会学教材,是我们努力认识其他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并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达到认识自身的途径之一。

费孝通

中文版序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这本书的中文版就要出版了,这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说明中国试图理解和采用西方的观点来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服务。组织和组织过程是这种社会运动的重要特征。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 1981 年,到今天已经出版了好几版(第五版将于 2003 年出版),每一版都有重要的修改,一方面是因为组织本身特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组织理论研究的发展。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对这两方面的变化都给予同样的关注。

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本书主要依据的是美国的经验。尽管社会科学根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并被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所推动,但在 20 世纪,美国却是组织研究的中心。不过,这样的格局明显地在改变。在过去的几十年,欧洲的学者越来越活跃,亚洲的学者也迅速地加入进来。结果是,我们获得了组织和组织过程的时空跨越。

很清楚的是,尽管组织形式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组织的重要方面仍然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不同。我们既需要了解差别,也需要欣赏共同的特征及其长处。如果可能的话,比较研究,包括组织的欧洲和亚洲模式,对于我们广泛地理解组织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全球化力量的增长,世界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越来越相互依赖,组织和组织过程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但却不可能消除差异。正如所有社会现象一样,组织就是一面反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镜子。

当我 2000 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为中国伟大而深厚的社会和历史所打动。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也正在经历新的组织形式,有的令人兴奋,有的令人不安。至关重要的是,学者们应该跟踪这些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在新的千年里,我希望我们有机会相互学习。

W. 理查德·斯格特

译校者的话

尽管本书的作者在这一版的前言中谦逊地说,自 1981 年本书第一版到 1997 年第四版书名和书的整体格局没有改变是因为自己学术的惰性或才思枯竭;同时作者也无不自豪地解释道,到今天为止,本书的框架仍然能够驾驭组织研究的最新发展。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组织研究仍然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不仅包括了社会学和管理学专家的种种努力,也包括了政治学和心理学甚至人类学家的不懈追求,如果有人期望建立一门“组织学”的话,恐怕很难在这些学科之间达成共识。

也许斯格特 20 年前就已经估计到“开宗立派”的危险,所以,他宁愿选择一条折中的道路,将各门各派的成果进行综合,并用他自己的分类功底,尽量使复杂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各种观点条理化,为初涉组织研究者跨入门槛或对组织研究已经有所了解的人深入下去提供一本深浅皆宜的文本。的确,具有不同组织研究知识基础的人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内容,从组织研究的基础、经典的理论和理论家,到今天争论激烈的各种学术流派。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本书尚没有涉及直接对传统甚至 90 年代初期组织研究的各种范式形成挑战的网络社会组织问题。萨维奇(Charles M. Savage, 1996)认为,对于组织理论而言,我们所面临是工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知识时代的早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已经成熟化的全球工厂和市场注入了一些新的变量,这些变量的影响就是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把工业化对人类社会组织的影响概括为工厂化模式的话,这些变量也是工厂化模式进入人类生活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即斯密/泰勒/法约尔瓶颈,甚至包括蒂马鸠/汉南、弗里曼/弗里格斯坦瓶颈(邱泽奇,1999)。

当然,这些挑战也是组织理论所面临的最严重困境和危机。简单地看,工厂化时期组织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劳动分工、自身利益、对任务付酬和与之相关的组织边界重组、等级体制或等级体制瓦解、归属感。当网络成为生产组织基本形式的时候,研究者将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假设的基础。就像从作坊制到工厂化的转变一样,从工厂化到网络化的转变也将带给人类社会一

个崭新的世界。如果把机械产业、电子产业看作组织理论重组的两个新起点的话(本书的5章),那么,网络不仅作为一种产业,也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将是组织理论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衷心地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为组织研究在中国发展的高起点做出一点贡献。

本书的翻译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博士组织,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席侃(第1—5章)、申薇(第6—8章)和李霞(第9—13章)翻译。此外,我翻译了三位译者漏掉的部分,包括每章的全部图表、所有注释,未译出的人名、专业术语、个别句子,漏译的个别段落以及不曾翻译的书后人名对照表、专业术语对照表,并逐段审校、改订了全部译文。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黄洋教授对本书翻译工作的组织和对审校工作的全力支持,诚挚地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和华夏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艰辛努力,尤其是在最后关头对原则的坚持、对质量的把关和对文稿的仔细审核。

邱泽奇

2001年12月24日

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前 言

这本书的第四版使我得以努力理解并利用最近和较前的研究成果,继续致力于组织的研究。这一努力早在近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62年,我便与杰出的组织专家布劳(Peter M. Blau)撰写了一本组织研究的专门教科书。那时,组织社会学这一学科刚刚问世,我确信我们的共同努力为这一新生领域提供了某些思想内核,甚至为它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指导准则。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1981年,我又重新回来编纂、综合、整理组织研究的成果,从而产生了本书的第一版。从此之后直至现在的第四版,书名与书的整体格局都没有改变。虽然这种执著有学术上的惰性或才思枯竭的因素,但我更相信这是因为其基本范畴——理性的、自然的及开放的系统——仍然可作为有效的分类,根据这样的分类,我们能有效地拣选并整理组织研究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一领域初看起来似乎混乱不堪,而且充斥着相互竞争的理论 and 范式,但我认为,原先的分类仍然能够驾驭它,并使它井然有序。

虽然有关理论的总体分类在近二十年内没有什么改变,但内容确有变化。读过本书第一版的人很容易认出本版的基本框架,并回想起早期开拓者作出的贡献。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有感于内容的变化:引入了大量新的研究视角,组织的规模和形式在发展趋势上发生了逆转,此外,还涉及了许多全新的主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组织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个体组织作为组织群体的一员、作为更大领域以及组织网络的组成部分,新的理论得以发展,以包容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过程和结构。

总的来说,在对第四版和第一版及其后的几个版本作比较时,我提醒读者注意两个总体趋势。首先,组织和组织理论在这段时间内已变得日益开放,尽管这种变化显得断断续续而且有点颇不情愿。正如我在本书正文中所提到的,早期的组织力图以各种方式将自身与其所处环境隔绝:虽然它们是开放系统,但却仍人为地限制环境因素对其结构和行为的影响。然而,渐渐地,在一段时间之后,区分组织及其环境的界线被突破并跨越了。“新”的组织与其供求者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相互协调和依赖关系,它不太可能拥有大量专职的全日制雇员,并且其大部分结构是由专家学者塑造的,控制其运作

的原理也是由这些专家学者提供的。这些专家学者来自于外部,与他们特定雇主的利益间有着相对少的利害关系。旧的模式强调组织的自主倾向,而新的模式则认识到相互依赖的事实,并强调发展适当联合的重要性(Ancona et al., 1996)。虽然长期以来,组织理论对开放系统一直褒扬有加,但组织研究者们仍须努力探询这个时代组织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深入而系统地阐明开放性的意义。

其次,在分类中所强调的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间的区别,只是对组织研究中的假说和方法进行区分的主要分界线,但这种界线即使没有消失,也已开始变得逐渐模糊了。更多的分析者意识到理性并非一成不变,理性的准则与理念也随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变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理性大体上存在于一系列用于执行某些任务的既定准则或是既存惯例之中。越来越多的分析者承认,那些从某一角度或相对短期的视角视为理性的行为,在另一角度或长期视角来看却并非如此。组织学习和进化论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领域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植根于准则和惯例中的智慧,而我在这个版本中花较多篇幅评述的制度理论的复苏似乎为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进一步对话提供了基础。

尽管有诸多新意,这个版本仍坚持着一些在先前版本中起指导作用的原则。在我看来,也正是这些原则使得本书有别于大部分其他组织研究的书籍。这些原则便是:

- 我用了几乎一样的篇幅描述“现实世界”中组织的变化和考察组织理论的变化——即我们对于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应该是什么的想法。虽然实践影响我们的思想,但思想也同样影响实践。
- 在描述和评价组织理论以及描述和评论经验研究两者时,我也用了大致相同的篇幅。如怀特赫德(Whitehead, 1925)所说的那样,科学研究的特征就是“一般原则”和“铮铮事实”之间的对质。
- 尤其是从第2至第5章,我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早期组织理论家和学者们的贡献。在注重新思想的同时,我认为回顾并了解起源也是十分重要的。
- 由于我接受的是社会学教育,所以,我首要关注的是组织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但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组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多学科的工作,所以,我尝试着认识并考虑其他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理论所作出的显著贡献。
- 虽然我不满意微观—宏观的二分法,因为它过分地割裂了主要关注组织中的个体研究和主要关注作为复杂社会体系及作为在更广泛体

系中行动者的组织的研究,但本书主要关注更为宏观层次上的分析研究。

- 在本书中,我试图不仅从管理人员的角度,更从各种参与者和大众(持股者),包括普通大众的视角来写组织研究。当前的大部分书多涉及管理者的利益,而我则把组织研究视为一个广泛且具社会意义的论题,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关注它。我们大多数人(并非只是管理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各种组织中工作,我们无一例外地受其行为的影响。所以,组织研究已成为一个对于大众而不只是对于管理者而言非常重要的论题。

我谨借序言的机会,向那些在完成本书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表示感谢。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学识上的高见,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而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给了我深切的友谊。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已算是不短的时间,所以,请原谅我在此不能把所有给予本书帮助的人们一一列出。但是,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

在堪萨斯(Kansas)大学,我完成了社会学本科及硕士学位的学业。在此期间,麦克克拉格基(Marston M. McCluggage)和沃里那(Charles K. Warren)支持我加入了社会学研究的行列,并对我早期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在我取得博士学位的芝加哥(Chicago)大学,有三位尊师:休斯(Everett C. Hughes)向我传授了他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在后来被称为制度分析的芝加哥学派;奥蒂斯·邓肯(Otis Dudley Duncan)和贝弗利·邓肯(Beverly Duncan)一道给了我学术研究及方法论的指导,并给了我他们的友谊;布劳(Peter M. Blau)给了我同他合作研究组织的机会,并同我一道在这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合著了一本论著。

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斯坦福(Stanford)大学度过的,所以,那儿的朋友与同事们就比较多:利维特(Harold J. Leavitt)和韦布(Eugene Webb)在我学术生涯的早期支持并激励着我。在斯坦福工作的第一阶段,我和多恩布什(Sanford M. Dornbusch)合作研究过权威体系,他至今仍是我最为亲密的朋友。稍后,我领导了一项关于医院中影响医疗质量的组织因素研究,在此研究过程中,我得到斯坦福医学院的布朗(Byron Wm. Brown, Jr.)和福里斯特(William H. Forrest, Jr.)的鼎力帮助。我和梅耶(John W. Meyer)在制度结构和过程的研究方面有着多年密切的合作,从中我又受益于他的创造性和独到见地。马奇(James G. March)和我虽从未在任何研究项目中合作过,但我们都长期致力于建立一种多学科、多学校之间的联系,并在斯坦福建立起面

向研究生的学术论坛,同时也在斯坦福与其他院校之间建起了学术上的联系。他一直是激发我思想的一个源泉,并与我有着深切的友谊。

斯坦福大学在组织研究领域拥有丰富的师资,几乎没有其他大学能与之相比,马奇称之为“能力的浓缩”。这其中有许多令人敬重的同事(有几人已去了别处),他们令我在这里度过的绝大部分时光,既充满活力,又令人欢欣愉悦。他们是:Stephen R. Barley, William P. Barnett, James N. Baron, Terrence E. Deal, Kathleen M. Eisenhardt, Roberto Fernandez, Mark Granovetter, Michael T. Hannan, James Jucker, Roderick Kramer, William G. Ouchi, Joanne Martin, Mibbrey McLaughlin, Jeffrey Pfeffer, Joel Podolny, Francisco Ramirez, Philippe C. Schmitter, Ann Swidler, Robert I. Sutton。

同样令人珍视的一些智力激发与社会支持来自于一批博士生,他们是:Jeffrey A. Alexander, Victoria Alexander, Elaine Backman, Karen Bradley, Bruce C. Busching, Carol A. Caronna, Glenn Carroll, Randi C. Cohen, Karen S. Cook, Andrew Creighton, Gerald F. Davis, Jacques Delacroix, Frank Dobbin, Lauren Edelman, Mary L. Fennell, Ann Barry Flood, P. Devereaux Jennings, Ronald L. Jepperson, James D. Laing, Barbara Levitt, Peter Mendel, Stephen J. Mezas, Weifan Min, Anne S. Miner, Brian Mittman, Susanne C. Monahan, Andrew E. Newman, Willie Ocasio, Seth S. Pollack, Amy Elizabeth Roussel, Brian Rowan, Martin Ruef, Claudia Bird Schoonhoven, Jitendra V. Singh, David Strang, Mark Suchman, John Sutton, Azumi Takata, Sharon Takeda, Patricia Thornton, Marc Ventresca, Gayle Watkins, and Lynne G. Zucker。我曾与他们一起工作研究,并从中获益匪浅。

但是,并非所有的才子都在斯坦福,这么多年来,我与一群令人景仰的朋友、学者们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他们是:Andrew Abbott, Howard E. Aldrich, Joel A. C. Baum, Janice M. Beyer, Nicole Woolsey Biggart, Robert E. Cole, Thomas A. D'Aunno, Paul Dimaggio, Neil Fligstein, J. Richard Hackman, Peter A. Hall, Robert I. Kahn, John R. Kimberly, David Knoke, Edward O. Laumann, Peter Marsden, Marshall W. Meyer, Christine Oliver, Donald Palmer, Charles Perrow, Walter W. Powell, Philip Selznick, Neil J. Smelser, Barry Staw, Arthur L. Stinchcombe, Rosemary C. R. Taylor, James D. Thompson, Andrew Van de Ven, Karl E. Weick, D. Eleanor Westney, Oliver E. Williamson, Sidney G. Winter, and Mayer N. Zald。他们也使我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所共事并从中获益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国际化。这些

有益的伙伴包括: Nils Brunsson, Søren Christensen, Tom Christensen, Lex Donaldson, Lars Engwall, David Hickson, Christian Knudsen, Cornelius Lammers, Helge Larsen, Keri Lilja, Renata Mayntz, Johan Olsen, Risto Tainio, and Chu-Tao John Wu。

我的终生伴侣乔伊(Joy)依旧对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抱以宽厚的态度,并时时温言相劝:人的一生,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同样,在这世上,除了组织研究,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

最后,本书要再一次地献给我们的三个孩子:杰妮弗(Jennifer)、埃利奥特(Elliot)和悉尼(Sydney)。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独立生活并结婚生子。最重要的是,虽然他们始终是我们的孩子,但他们与他们的爱人都已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

斯格特(W. Richard Scott)

致 谢

作者要感谢下列图表所有者给予我版权,使我在本书中得以引用:

表 6-1。选自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p.35, copyright © 1995 by Sage Publication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age Publications, Inc.

图 7-1。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and Schuster from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by Oliver E. Williamson. Copyright © 1975, 1983 by The Free Press.

图 7-3。选自 Michael T.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The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American labor unions, 1836-198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1987), Figure 3, p.92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图 8-1。选自 Gerard F. Davis, Robert L. Kahn and Mayer N. Zald, "Contract, Treaties, and Joint ventures." In R. L. Kahn and M. N. Zald (eds.), *Organization and Nation States: New Perspectives on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Figure 2.2 (p.35). Copyright © 1990 by Jossey-Bass, Inc. Publisher.

表 10-1。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JAI Press from W. W. Powell, "Neither markets nor hierarchy," in B. Staw and L. Cumming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 Behavior*, Vol. 12, 1990.

图 10-1。Reprinted by Alfred D. Chandler, Jr., *Strategy and Structure*, p.10, by permission of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opyright © 1962 b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作者介绍

W.理查德·斯格特，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商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教育学院教授、医学院教授，斯坦福组织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现在仍然活跃于组织研究领域。

斯格特教授著述丰富，最新的著作包括《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Prentice Hall, 1998)第四版、《制度变迁与卫生组织》(*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with Martin Ruef, Peter Mendel, and Carol Caron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组织》(*Organizations*, with Martin Ruef, Peter Mendel, and Carol Caron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制度与组织》(*Institution And Organizations*, Sage 2001)第二版。

内容简介

这本清楚、简洁的著作，回顾了组织研究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特别讨论了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三个视角的早期发展和现状，为人们理解纷繁复杂的组织理论及其当代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明亮的框架。本书以社会学的组织研究成果为主，同时吸收了其他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理论对组织理论作出的贡献；不仅从管理人员的角度，更从各种参与者和普通大众的视角来写组织研究，因而，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有益于当代和将来的管理者，对任何生活在这个以组织为特色的社会中的人都是有益的。

68.493/20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第一辑书目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

〔美〕 Jeffrey C. Alexander 著

Applied Mathematical Demography

应用数理人口学

〔美〕 Nathan Keyfitz 著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社会学主要思潮

〔法〕 Raymond Aron 著

社会学原理

社会学原理

〔日〕 青井和夫 著

Modern Sociology Theory

现代社会学理论

〔英〕 Malcolm Waters 著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组织理论

〔美〕 W. Richard Scott 著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当代社会问题

〔美〕 Vincent N. Parrillo
Ardyth Stimson 著

Medical Sociology

医学社会学

〔美〕 William C. Cockerham 著

Evaluation: A Systematic Approach

评估：方法与技术

〔美〕 Peter H. Rossi
Howard E. Freeman 著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美〕 Jonathan H. Turner 著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方法

〔美〕 Earl Babbie 著